◆杂　谈

为何总以棋测“智”

机器与人的思考风格并不一致，智力孰优孰劣并不好测，但一直以来，全球重要IT公司几乎都偏好用人机棋类博弈，来检验人工智能的进步。

棋类博弈自古被视为一种关乎智力的高级挑战。和其他智力测试相比，弈棋具有直接对抗的特点，紧张对局中，对手一手精妙棋招，更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智力上的刺激和挑战。弈棋随机和不可控因素更小，因此对局双方的决策能够更直接地控制整个局面的走势，这进一步增强了智力的对抗性。

机器真正开始通过棋类挑战人类智力，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至195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在电脑中设计国际象棋程序，几年后，人与电脑下棋的新生事物就出现了。

随着电脑CPU的功能越来越强大，2006年后，人类已无法战胜国际象棋高级人工智能程序。甚至有国际象棋选手在正式比赛期间作弊，偷着让电脑支招，结果被发现。

电脑在国际象棋上挑战人类成功之后，所有人的目光又聚焦在了围棋这项古老的东方棋类运动上。然而对电脑来说，围棋似乎是个比国际象棋更“难”的东西，也被一些人称为人类最后的智力骄傲。

不同于国际象棋，围棋每回合的可能性更多，共有250种可能，一盘棋可以长达150回合。同时，围棋局面多变，无法被算法穷举。更专业点说，围棋难的地方在于它的估值函数非常不平滑，差一个子盘面就可能天翻地覆，同时状态空间大，也没有全局的结构。这两点加起来，使以往能在国际象棋中从容胜出的人工智能无法应对。

此次“阿尔法围棋”程序敢于叫板李世石，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电脑的“固定”程序逻辑，融入了自学习，或者说是深度学习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阿尔法围棋”技术架构采用的是模仿人类大脑神经模式，而不再单单依靠机器的蛮力“强记”，即使这样，也是经过了几千万次的机器自我围棋对弈与学习，才有了挑战人类的勇气。（2016年3月10日《东方早报》新华）

（上接1版）

深化律师制度改革。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全面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并重，扎实做好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推动落实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制约律师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强律师执业的规范和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依法诚信执业。推进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推动建立从优秀律师中招录法官检察官制度，构建律师和司法人员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常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研究完善符合律师行业特点的扶持保障政策，推动完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探索建立律师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推动修订律师法，将律师制度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规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能力。推进法律援助立法。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案件代理制度，将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参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机制和法律援助参与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件办理工作机制。

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引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切实做好将司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各项准备工作。

完善司法协助体制。积极推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立法，进一步健全司法协助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司法部长会议机制作用，深化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的交流合作。

积极做好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和选任管理人民陪审员相关工作。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做好其他各项参与的改革任务。

◆观　点

防止改革中出现折腾现象

我们的改革一直是两个方面：一是存量改革，也就是要纠正过去的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二是增量改革，即通过改革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增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随着形势发展出现的新问题，还有些是一些领域、地方在改革中折腾出来的问题。

改革中出现瞎折腾现象，有许多例证。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机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应该承认，每一次改革都有其必要性，且每一次机构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在许多老百姓看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机构改革，改来改去，也有不少瞎折腾。折腾的后果是机构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多，婆婆越来越多，扯皮的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难办。所以才有了十八大以来的大力下放审批权和精简机构，以及八项规定等来解决这些问题。再比如说，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不免也出现瞎折腾的情况。有研究通过对中国企业的改革调查发现，钢铁企业、火电企业、医疗企业的改革均出现折腾的情况。有一些地方的医药企业的改革、重组，结果变成了卖了厂房，没了设备，变成了不能生产医药的企业了。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去产能，但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一些领域却出现了产能越来越大，在去库存中库存越来越多的情况。在高校里，院系调整、科研改革也存在着瞎折腾的现象。

这种折腾式的改革带来的后果：一是改革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使改革的成效打了折扣；二是改革中的某些折腾直接损害了百姓利益，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上升，如改革中的土地征用、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导火索；三是影响人们对改革的信心。由于改革的政策缺乏稳定性，改革的措施缺乏连续性，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导实施的改革措施不一样，使人们对未来预期产生动摇。

为何在改革进程中，会出现瞎折腾的现象？分析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改革决策不走群众路线，不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造成决策失误。二是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导致政策不配套，甚至出现冲突。由于没有责任追究制度，只是拍屁股走人，结果瞎折腾付出的成本让百姓承担了。三是一些决策者存在“本领恐慌”，但为了追求业绩蛮干。30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改不改革是一个态度问题，是否改革成为衡量一届政府、一个官员业绩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改革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深水区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有些官员出现了“本领恐慌”，本着良好的愿望干了不少瞎折腾的事。有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以至蛮干、瞎干。四是有一些改革措施完全出于一些官员和决策者的私利。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都有可能会肥一帮人。由于有的改革缺乏民众参与，决策缺乏透明度，方便了一些领导干部滥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大到谋取暴利，小到突击提拔干部、突击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等。

我们常讲，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推进改革，“不动摇”讲的是立场问题，“不懈怠”讲的是态度问题，“不折腾”讲的就是方法问题。避免改革中出现折腾，就要从方法论着手，对改革要有正确的理解。为此，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一是在领导改革的思想路线上要做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二是在改革的思路上要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统一；三是在改革的方法上要做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统一；四是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关系；五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同时，要把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到改革进程中去，通过鼓励改革、创新改革方式和提高执政能力来解决。（2016年3月7日《北京日报》秦宣）

中国城市建设应补一堂“美术课”

这段时间有本书引起人们关注，叫《中国十亿城民》，为英国学者汤姆·米勒所著。他在书中提了个问题：中国很多城市为什么那么难看？作者还列了三种“难看”现象：一是外形丑陋，失去灵魂。以“发展”之名，诸多城市几乎被翻建了一遍，建成不到30年的楼房占了一多半。方块形建筑物包裹着水泥或瓷砖，既不美观，也缺乏人情味和历史文化。二是权力美学盛行。你总能发现豪华气派的政府办公大楼和依照北京模式建出来的宽阔林荫道，而不管它是否符合本地需求。三是“千篇一律”。城市规划惊人相似，大大小小新城区看起来如出一辙。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估测和调查数据让人惊讶：这几年，我国每年拆除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计算，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浪费达4600亿元。“建筑短命”，主要还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或有损自然环境或有害城市天际线或纯属怪异等。这又说明，“难看”不仅意味着设计有缺陷，更意味着巨大浪费。所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加强对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原因也很简单：“美”就是协调、宜居、舒适、持续、特色。

曾有中国学者指出，城市建设四大弊端正日趋严重，有绿化，没有山水；有建筑，没有栖居；有规划，没有特色；有指标，没有记忆。于是呼吁：城市建设应补一堂“美术课”，处理好实用和审美之间关系。问题是，在很多时候，“专业审美”根本无法和“权力审美”抗衡。“规划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几乎是许多城市写照。换句话说，城市“难看”，实质上是决策出了问题。

为防止“权力审美”泛滥，有些国家设定了建筑批判制。即由专业群体对规划设计“百般挑剔”，以免“建设性浪费”发生。有鉴于“建设性破坏”太大，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建议，“拿来”建筑批判制。其实，在地方重大决策包括城市规划设计中，可行性论证就相当于建筑批判制，若能名副其实，权力任性应能得到有效抵制。这需要专业人士能坚持原则，敢于“拣对的说”，不能“专挑领导能接受的说”，更需要决策者理智对待非议，不能误读误用“力排众议”。

决策和执行，有时确实需要“力排众议”。否则，机遇就会在犹豫不决中丧失。但我们还应明白，“力排众议”是对质疑作出合理解释和科学论证之后再行事，或说是要把反对意见所预测风险化解后再决定怎么办，而不是对所有质疑和反对都概不理睬，只管由着自己性子来。前者属于“集思广益”，后者属于“一意孤行”。城市规划极具专业性，只有正确对待“力排众议”，才能从“专家审美”和“市民审美”中汲取智慧，避免城市因规划设计出错而“难看”。

城市建设最大特点是“抹上一笔，很难拿掉”，弄不好会窝囊人几十年，为官掌权者对城市规划设计当有足够敬畏心。同时，还要严格执行决策问责制度，让那些只顾铺摊子不管后果者受到责任追究，用制度来防止“政绩的眼睛”和“商业的眼睛”取代“审美的眼睛”。规划设计更科学，实用和审美相得益彰，才能不断提升城市品质造福百姓，也为历史留下更多精彩和赞叹。（2016年第1期《群众》刘根生）

◆评　论

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创新者撑腰

“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容错机制”，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改革发展过程中要宽容“探索性失误”，让干部卸下思想包袱，敢想、敢做，更要引导干部严以用权，科学、民主决策，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

改革开放30多年间，有不少涉险滩、闯关夺隘的成功时刻，也有过迎难而上、屡败屡战的奋斗故事。今日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释放、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是改革创新事业不断进步的原动力。干部作为带领人民干事创业的“关键少数”，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小视。那些敢于拎着“乌纱帽”锐意改革的人，是干部队伍中的精英，远胜于在困难面前“怕出错、怕问责、绕道走、耽误事”的庸官懒吏。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后面还有许多难啃的硬骨头。面对各种深层次矛盾和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一些干部难免有畏难怕错情绪。在这种背景下，“改革探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逻辑既不合理，也不科学，还会挫伤干部的改革热情。“容错机制”就是要用制度为真正的改革创新者撑腰，让他们“轻装上阵”，鼓励他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担该担之责，惩应罚之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容错机制”鼓励党员干部敢负重、敢作为，但绝非乱作为的“尚方宝剑”。它仅适用于改革创新过程中的“探索性失误”，而不是少数干部独断专行、盲目决策、谋求私利的“挡箭牌”，不能为决策者任性而为造成的损失“埋单”。只有厘清是非对错，才能体现制度的刚性、政府的公信力。

领导干部有了敢于负责的胆量和气魄，固然可嘉。但是，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负责，还需要有善于负责的本领。善于负责，必须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容错机制”为改革创新者撑腰打气，最终目的是让干部能干成造福于民的好事。期待这项机制能发挥出强大的能量，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同时帮助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增强干部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的决策自信，提高决策水平。（2016年3月11日《西安晚报》吴振东　荣启涵）

◆史海钩沉

从癸酉之变看历史周期律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庆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就当了大清的末代皇帝，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

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

原来，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可怕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率领突击队的叫祝现……

汪楠稍作思考说：“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上报假情况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请假了，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举报堂兄谋反，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

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真的吗？我这就进宫禀报！”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低声劝导举报人：“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千万别再提了。”

8月份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即将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

9月底，嘉庆帝从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

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吉伦火了：“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

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吉伦大为恼火：“我大清国泰民安，天下归心，正是太平盛世，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

10月7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匆匆进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

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幼稚、幼稚！难道吉伦大人的部队是摆设？皇帝老子家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点，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

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林清的外援及时跟进，大清皇宫将被连锅端！凑巧，嘉庆的二儿子、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然稳住了军心，局面开始扭转。在禁军的围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敌众惨遭屠戮，起义失败。

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股天理教队伍，稍早前已经起义，剑指北京。清政府用九牛二虎之力，耗时3个月，才勉强平息事态。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他发明了“因循疲玩”这个新词，直指汪楠等人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如果他们干活认真点，灾祸完全可以避免，至少不会闹这么大。

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哪个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吏治的腐败，出事是必然的。

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地“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按下葫芦起来瓢。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

那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就是为了不惹麻烦。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8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要想白面贼（便宜），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动向在社会上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

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无所谓，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

人称“溜溜球”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

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

嘉庆有一次咨询刘墉：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吾半天，就说两个字：“尚可。”嘉庆慨叹：这么大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

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

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让位给个人小利。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

同豫亲王一样，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

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

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想到会赢；太平军初兴，地方守吏以邻为壑，最终酿成大祸；甲午之败，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2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指出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2016年1月1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习骅）